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基础稳固

近期巴基斯坦国内

政治形势“一波三折”，有人认为巴国内政局变动会影响中巴关系发展，波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对此不必过度担忧。纵观中巴关系发展历程，无论巴国内形势如何变化，政治舞台上活跃的各方都深知中巴友好关系的重要性——这是巴基斯坦的外交基石，动不得，也动不了。

近期，巴国内形势突变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4月11日，议会投票选举产生的巴基斯坦新任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宣誓就任。

此前，由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人民党等反对党组建的联盟发起对伊姆兰·汗的不信任投票，后几经周折，当地时间4月10日凌晨，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会下院）通过了不信任动议，伊姆兰·汗成为该国历史上首位遭罢免的总理。在此情况下，伊姆兰·汗所领导的正义运动党与如今大权在握的穆盟（谢）依旧摩擦不断，这几日各地抗议四起，政治局势发展和社会治安状况都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有人认为，巴国内政局变动会影响中巴关系发展，波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中巴关系的未来，以及两国之间的走廊合作，并不用担心。

长期以来，无论巴国内政治局势如何变化，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从未因政权变动而遭遇冲击，这也是该国一直被称作“巴铁”的原因之一。新任总理夏巴兹·谢里夫11日宣誓就职时表示，中国

是巴基斯坦忠实可靠、值得信赖的好伙伴，始终支持巴基斯坦发展。中巴友谊地久天长，且深植于两国人民心中。夏巴兹·谢里夫12日在首都伊斯兰堡总理府会见中国驻巴大使馆时代办庞春雪时表示，一直以来，中巴相互支持，互利合作，两国关系堪称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典范。在中国领导人关心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推进，取得丰硕成果。夏巴兹·谢里夫再次强调，巴基斯坦新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进一步加强两国在农业、科技、教育、扶贫等各领域的合作，以更大魄力、更高效率推动走廊建设，打造“巴基斯坦速度”，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纵观中巴关系发展历程，无论巴国内形势如何变化，政治舞台上活跃的各方都深知中巴友好关系的重要性——这是巴基斯坦的外交基石，动不得，也动不了。

巴基斯坦穆盟（谢）是巴基斯坦政坛的“常青树”，同时也是中巴关系长久以来的推动者。中巴经济走廊便是在前总理纳瓦兹·谢里夫执政期间提出并快速发展的，新任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任旁遮普省首席部长期间也为走廊建设作出了不少贡献。可以说，走廊合作一直是巴基斯坦穆盟（谢）执政的重要政治资产。如今局势下，无论是深化中巴关系，还是要促进经济复苏，继续推动走廊建设都是一条必由之路。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通胀压力让巴基斯坦经济状况难言乐观。新总理就职伊始，为迅速获得民意支持，已经表示将把最低工资大幅提高至2.5万卢比（约合860元人民币），同时将文职和军事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提高10%。

中巴经济走廊不仅是两国经济发展的抓手，更是国际合作共赢的典范，必将帮助巴基斯坦新一届政府将发展红利辐射全国，促进巴国内经济转型，增强经济韧性。对巴基斯坦而言，尽快稳定国内政局，把精力专注于提振本国经济，是各方利益所在，也是眼下的关键所在。

古巴经济进入疫后复苏阶段

本报记者 杨啸林

拉美经济观察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古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稳定经济和疫情应对措施，包括优先保证粮食、燃料、化肥、药品等产品供给，与此同时，古巴加速推进国民经济转型。为吸引更多外资、刺激经济发展，古巴政府正式启动货币改革。但也应看到，疫情之下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进一步收紧。古巴国内生产能力不足、供应短缺，以及俄乌冲突等问题给古巴经济复苏带来负面影响。



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一名男子戴着口罩在一排老爷车旁等待顾客。 新华社记者 朱婉君摄

随着新冠疫苗接种率不断提高，古巴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日益好转，经济活动逐步恢复，旅游业也重新开放。在2020年经济萎缩10.9%后，2021年古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2%，正式进入疫后复苏阶段。

疫情暴发后，古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稳定经济和疫情应对措施，包括优先保证粮食、燃料、化肥、药品等产品供给，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促进相关产品的加工和销售，在雇用劳动力方面给予企业更大灵活性，逐步稳定了国内生产生活。与此同时，古巴也加速推进国民经济转型。2021年4月举行的古共八大赋予古巴经济“模式更新”以更大活力，强调非国有部门发展有助于提升国有部门经济效率和生产率，鼓励发挥外资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同年8月，古巴政府颁布法令，允许成立中小微企业。至今年3月，古巴经济计划部已累计批准成立中小微企业2478家，其中包含2388家私营企业，预计这些中小微企业能够创造约4万个工作岗位。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周密表示，如果古巴能够进一步推动并坚持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为私营资本提供充足发展空间，未来能够释放巨大活力。

为吸引更多外资、刺激经济发展，古巴政府还正式启动货币改革，逐步停止流通与美元等值的可兑换比索，使比索成为古巴唯一法定货币，加速实现货币与汇率并轨。“古巴国内长期流通比索和可兑换比索两种法定货币，二者间兑换汇率存在差异。双轨制货币和汇率体系曾在一段时间内稳定了古巴经

济。”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古巴研究中心秘书长韩晗表示，但发展至今已成为国家金融和贸易的制度制约，不利于吸引外国投资。正如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所言，统一货币的决定是一系列紧急经济改革的一部分，以帮助古巴摆脱过去3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实行货币改革是古巴进行各经济领域结构调整的基础和前提，将有效刺激劳动积极性、提高生产力、完善商业体系，使古巴国内经济与国外市场之间保持平衡，减少进出口结算面临的技术障碍，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但也应看到，古巴经济复苏与转型仍面临巨大挑战。疫情之下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进一步收紧，同时国内生产能力不足、供应短缺等问题依旧严峻，通货膨胀率一度高达70%。

韩晗表示，古巴是小规模外向型经济体，经济结构发展路径依赖较强，服务贸易及旅游业是其重要的经济部门，国际市场波动对其影响较大，“疫情和美国封锁固然是古巴供应短缺、通胀高企的重要外因，但古巴经济制度更为深刻的问题在于缺乏物质刺激的再分配制度和经济体系的脆弱性，这些制约着古巴经济的内生性发展”。

周密表示，经济制度的改进并不一定意味着投资者意愿的增强，尤其是在发展模式转换的过程中，古巴原有经济力量一定程度上不愿放弃既得利益，缺少主动改变的动力。当前古巴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作用依然有限，要素价格还不能有效反映供需关系，市场信心尚未确立。

此外，俄乌冲突也给古巴经济复苏带来负面影响。一方面导致全球能源、矿产、小麦等商品价格居高不下，给高度依赖进口的古巴经济带来额外压力，增加了输入性通胀风险。另一方面，俄罗斯是古巴最主要的游客来源地之一，当前欧美多国对俄罗斯航班关闭领空，导致到访古巴游客数量再次锐减，古巴经济复苏的脚步可能会再一次放缓。

当前全球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中古两国合作与战略沟通并未因此减弱。近年来，中国一直是古巴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和主要货物出口目的地，其中糖、镍、朗姆酒和龙虾等传统产品表现突出。2021年底，中古签署“一带一路”建设相关合作规划，为两国合作创造新机遇，为共同发展增添新动力。

“中古经济合作的共同价值观一致，在发展模式上有着不少共同点。”周密表示，中古在农业、医疗等技术领域合作基础扎实，空间广阔。未来，中古经济合作可着力于增强经济发展的供应链韧性，通过包括数字经济合作在内的多种方式提升双方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动力，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更好地回应和满足民众的需求。

韩晗表示，中古双方在生物制药、管理信息化建设、旅游及交通基础设施、工业产业升级、改造等多个领域都存在广泛合作空间。但中资企业对古巴市场规模、偿付能力及营商环境缺乏深入了解，因而存在一定顾虑，对投资的渠道和信息来源也尚不够通畅，未来双方应更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平台作用，积极开创中古企业合作新局面。

古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截至今年3月

古巴经济计划部累计批准成立中小微企业 2478家

其中私营企业

2388家

世界贸易组织预测

全球商品贸易额



2022年以市场汇率计算的全球经济



本报日内瓦讯(记者杨海泉)4月12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最新一期《国际贸易统计与展望》报告指出，俄乌冲突降低全球贸易景气，给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本已脆弱的全球贸易复苏带来新风险。

据世贸组织预计，2022年全球商品贸易额将增长3.0%，低于该组织此前预测的4.7%，2023年全球商品贸易额将增长3.4%。世贸组织经济学家根据模拟预测，2022年以市场汇率计算的全球经济预计将增长2.8%，比之前预测的4.1%下降1.3个百分点。由于俄乌冲突的不确定性，预测亦存在不确定性。这场危机对全球经济最直接的影响是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上涨。尽管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世界贸易和产出中所占份额较小，但它们是食品、能源和化肥等基本商品的主要供应国，这些商品的供应目前正受到威胁。通过黑海港口的粮食运输已经停止，这可能会给贫穷国家的粮食安全带来严重后果。

世贸组织总干事恩戈齐·奥孔约-伊维拉表示，俄乌冲突给人类带来巨大痛苦，并在关键时刻损害了全球经济，世界各地都将受到影响，特别是粮食供应减少和食品价格上涨对低收入国家民众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在俄乌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世界需要更多贸易以确保稳定、公平地获得必需品，而限制贸易将威胁到家庭和企业的福祉，并使从疫情中实现持久经济复苏更加艰难。伊维拉强调，各国政府和多边组织必须共同努力促进贸易。历史经验表明，把世界经济分裂成相互竞争的集团，以及抛弃最贫穷国家，既不会带来繁荣，也不会带来和平。

第二届中国—新加坡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论坛举办——

推进国际商事争议解决创新发展

本报讯(记者朱琳)第二届中国—新加坡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论坛近日举行。论坛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贸促会)、新加坡律政部和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以下简称争端解决组织)共同主办，在北京、厦门和新加坡分设会场。与会嘉宾围绕“国际商事争议解决发展与未来”主题，就调解、仲裁、诉讼等国际商事争议解决途径的新热点、新发展、新机遇等展开讨论。

中国贸促会党组书记、会长任鸿斌表示，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妥善化解国际商事争议，是平等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是深化合作共赢发展的重要渠道。

近年来，中国逐步完善涉外法治规则体系，作为首批签约方签署了新加坡调解公约，健全了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平台。为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商事

争议解决秩序，任鸿斌建议，应当坚持与时俱进，推进国际商事争议解决创新发展。坚持互联互通，实现国际商事法律合作协同发展。坚持同舟共济，助力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表示，借助新加坡与中国之间日益紧密的商业和贸易往来以及两国间深厚的法律知识积淀，建立新中争端解决联合机制，可以融合优势资源，在人员配置、规则制定等方面实现互利互补、协同增效。

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副局长张俊荣认为，数字经济兴起、绿色经济增长，以及中国与东盟贸易往来深化，不仅为新中两国企业带来广阔发展机遇，也为两国律师事务所带来新的业务增长点。张俊荣说：“尽管全球依旧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各国与亚太地区之间仍

然蕴含诸多机遇，伴随世界经济从新冠肺炎疫情中逐步复苏，新中两国企业应抓住新契机，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

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黄惠康看来，以调解、仲裁、司法为代表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既是一国法治发展水平和市场经济成熟度的真实反映，也是一国营商环境和参与全球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他指出，疫情的暴发和蔓延，更加凸显在线解决纠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互联网+司法”开辟了传统司法模式变革的新时代，而且处于逐步完善的上升期，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领域呈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

仲裁如何创新、仲裁创新如何通过国际合作提质增效？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肖永平认为，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建设联合仲裁机制与

机构，是应对当前亚洲国际商事仲裁吸引力不强等挑战，以及引领未来发展的可行之道。

新加坡仲裁员协会会长郑裕能指出，国际合作既是提高国际仲裁和司法成效的催化剂，同时也是它们得以成功实践的必备条件。2021年12月，新中两国最高法院“云签署”两份合作谅解备忘录，为国际社会司法合作提供了有益借鉴，树立了该领域创新和国际合作的典范。

中国涉外法律服务工作起步较晚，但市场广阔，需求巨大。新加坡国际化法治化水平较高，且有联通东西的桥梁优势，两国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合作空间广大。参加论坛的嘉宾们纷纷表示，新中两国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领域携手合作、交流互鉴，将在推动更多国家参与、寻求更广泛深入合作，满足更多企业和个人诉求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